

中国现代
文学馆
青年批评家丛书
第二辑

何同彬 著

重建青年性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何同彬 著

重建青年性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建青年性 / 何同彬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6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ISBN 978-7-301-24360-2

I. ①重… II. ①何…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6438 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360-2/I·278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2.75 印张 320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l@pup.pku.edu.cn

丛书总序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先生倡议和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响应下，于1985年正式成立的国家级文学馆，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学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期刊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为文化的薪传和文学史的建构与研究提供服务。建馆二十多年以来，经过一代代文学馆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集文学展览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交流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学博物馆，并正朝着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

为了加快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中心建设的步伐，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从2011年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客座研究员制度，并希望把客座研究员制度与对青年批评家的培养结合起来。因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问题不仅是批评界内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于整个青年作家队伍乃至整个文学的未来都具有方向性的问题。青年评论家成长滞后，特别是代际层面上“70后”“80后”批评家成长的滞后，曾经引起了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担忧甚至焦虑。因此，客座研究员的招聘主要面向“70后”“80后”批评家，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学术平台为青年评论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经过自主申报、专家推荐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委员会的严格评审，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招聘了

两期共 19 名青年评论家作为客座研究员。第三批客座研究员的招聘工作也即将完成。

两年多来的实践表明，客座研究员制度行之有效，令人满意。正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青年评论家在学术上、思想上的成长和进步非常迅速。借助客座研究员这个平台，通过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例会和学术会议，他们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姿态快速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场，关注最新的文学现象、重视同代际作家的创作，对于网络文学、类型小说、青春文学等最有活力的文学创作进行即时研究，有力地介入和参与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在对青年作家的研究及引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70 后”“80 后”批评家的代表，他们的“集体亮相”，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格局和结构，带动了一批同代际优秀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标志着“70 后”“80 后”青年批评家群体的崛起。鉴于客座研究员工作的美好成效和巨大社会反响，李冰书记在第一批客座研究员到期离馆时曾专门作出了“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要进一步扩大规模”的批示。

为了充分展示客座研究员这一青年批评家群体的成就与风采，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决定推出“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评论家丛书”，为每一个客座研究员推出一本代表其风格与水平的评论集，我们希望这套书既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收获，又能够成为青年批评家们个人成长道路的见证。丛书第一辑 8 本在 2013 年 6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后引起了巨大反响，现在第二辑 12 本也即将付梓出版，我们对之同样充满期待。

是为序。

吴义勤

2014 年春于文学馆

重建“青年性”

——我的批评观

毋庸讳言，我们当下的青年群体——包括青年批评家——本质上是缺乏真正意义的“青年性”的，而没有“青年性”的文学和文化是没有活力和希望的。那什么是“青年性”呢？“青年性”的核心价值是基于共同体责任的反抗，反抗什么？反抗蒙昧、反抗私欲、反抗诱惑、反抗权力的滥用和公器的私权化，反抗没有责任感和理想情怀的庸碌，反抗基于谋求名利和安全性的过度“和善”，反抗那“温柔”又“残酷”的世故习气……需要反抗之物如此之多，以至于反抗尚未发生或刚刚发生，青年就被压垮了，或“招安”了。

中国进入 90 年代之后就没有一个本质性的青年群体的存在了，尼采所说的“青年之国”、梁启超所说的“少年中国”、鲁迅所说的“有声的中国”恐怕越来越渺茫，相反，“老大帝国”的情状日益顽固。那么谁在抑制青年的出现呢？当然是老年人。中国文化历来是老年性的文化，从古至今所有权力都控制在老年人或未老先衰的人手里。年轻人要想成为权力的合法的、合理的接班人，就必须接受这种权力等级的现状，必须小心翼翼地复制自己的父辈和祖辈的老路。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即权力的让渡需要顺从者，而不是掘墓人。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青年是没有活力的、没有勇气的，他们必须“顺从”，借用鲁迅的话就是：“现在的青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派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

美国学者沃特森认为：“我们的时代和过去许多时代一样，上演着一个持续、残忍、但又隐秘的老年人对年轻人的战争。”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特别重视年轻人和创新的时代”，但悄悄进行的却是“言论管制和现有秩序的维护”。所以，举目四望，当下能够诉求和实践反抗本性的青年人越来越罕见，有的人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变成“愤青”——“当下喷粪的肾上腺素分泌紊乱人群”，有的则自暴自弃地颓废为“达观”的“屌丝”，更多的人未老先衰、早生华发，按照安全、固定的制度逻辑盲目而庸碌地消耗自己的一生。

所以，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作为一个青年批评者首先要重建“青年性”，重新呼唤一种源于自由渴望的反抗冲动，或者进一步强调，这种重建首先要构筑在对现有文化的祛魅和破坏之上，简单概括如下：

检查：“对话 老人——‘让我们继承下去吧。’青年——‘让我们检查一切。’19世纪就是如此。”（司汤达反击法兰西学院古典派权威时的题跋）

戳穿：“这些话，好像是牢骚，但也是不得不发的牢骚。因为问题既已存在，与其加以裱糊，不如把它戳穿。戳穿之后，我们才能了解到它的严重，才能去思索、才能去解决。”（李敖）

捍卫：“永不疲倦地在我们的青年中捍卫未来，抵制那些未来圣像的破坏者。”（尼采）

自信：“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如果回到文学或文学批评的场域探讨“青年性”重建的问题，那么我们必须首先要打破目前这个通过“纯文学”、“文学自主性”、“学

术化”、“学院化”等等概念所建构的话语封闭性，青年批评者应该摆脱一种过度职业化的话语惯性，把抽象、空洞而恶性重复的文学问题放置在一个更具共同体关怀和责任意识的“公共性”的层面上来，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指出的：“要改变这种状况（个人自由与集体无能同步增长）之可能性，有赖于 agora——这是一个既非私人，亦非公共而同时恰恰又更私人、更公共的空间。在这空间里，私人问题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相遇，不仅仅是为自我陶醉之快乐，也不仅仅是为通过公共展示而寻找某种疗治，而是寻找一种集体操控之手段，其力量足以将私人提升出他们所遭受的私人性的不幸；这一空间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些观念，并形塑为‘公共之善’、‘正义社会’或‘共同价值’。”^①

① [英] 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目 录

丛书总序 吴义勤 5

重建“青年性”——我的批评观 7

第一辑

“公共性”与启蒙文学的困局

——重返 1980 年代文学的启蒙语境 3

主体的修复与启蒙文学的话语困境

——对 1980 年代前期文学的启蒙考察 30

主体游移与启蒙话语的裂变

——对 1980 年代中后期文学的启蒙考察 50

晦涩：如何成为“障眼法”？

——从“朦胧诗论争”谈起 70

忠实于我的时刻越来越“多”

——对小海近期创作倾向的考察 85

重返 80 年代的诗歌精神：必要性与可能性 101

我们应当如何爱国？

——重读《我爱这土地》 106

知识者的倦怠之书

——我看《春尽江南》 111

浮游的守夜人

——从北岛《午夜之门》谈起 116

关于政治和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成就本身并不能使一个作家摘取桂冠 119

第二辑

大时代的死亡与再生

——1990年代以来的精神困境 125

回到尼采的质问

——19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意识的症候 142

文学的盛筵与罗网

——论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历史化”倾向 168

现实的幽灵与历史的梦魇

——论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现实主义”障碍 185

“历史”与“反抗”的意志

——1990年代以来“先锋”意识的瓦解 199

“历史是精神的蒙难”

——对当下文学史思维的思考 225

从“自投罗网”到文学“憎恨”

——对文化研究思潮的思考 237

知识分子：过期的死亡宣判 248

文学，历史罗网中的死亡挣扎

——关于尼采的读札 260

智慧的劫掠与死者的狂欢

——从鲁迅说起 273

学院文学教育二题 283

第三辑

- 边界互渗的生机与险境
——浅谈江苏新世纪诗歌的民间力量兼及民间的困境 297
- 空间生产与网络诗歌的瓶颈 307
- 死亡的边界 312
- 亡灵的声音与晚期的界限
——欧阳江河浅议 318
- 关于“介入的诗歌”的谈话 332
- 孤独与寂寞之中的创造
——也谈当下文学的“可持续写作” 338
- 附录：“寻找政治”与永恒的批判
——何同彬访谈 348

第一辑

“公共性”与启蒙文学的困局

——重返 1980 年代文学的启蒙语境

肇始于世纪之交,而在当代文学研究场域内成长为一种方法的“重返 80 年代”,从来不回避自己“历史化”、“陌生化”、“知识化”、“政治化”、“学术化”等等亦新亦旧的诉求^①,然而这一在创新和反思的意图下展开的丰富的知识叙事,无非仍旧停留在业已遭受多方质疑的“文化研究”的理路之内。“重返 80 年代”在詹姆逊“永远历史化”的“绝对的口号”之下显然无法实现所谓的“超历史”^②,“历史化”被简单地转化为“知识化”后果之后,实现的也许仍旧是本雅明所描述的“历史天使”面前的“单一的灾难”和“直逼天际”的“残垣断壁”^③,或者在“文化研究”的范畴内实现了“历史大联合”的事业和“政治可靠性”^④的目标。当然,詹姆逊是想借此“迎头痛击”后现代主义,而“重返 80 年代”真正能“痛击”的仍旧是未被实现的启蒙和无法回避的公共性创痛,与一切知识的企图一样,“政治可靠性”同时也兼顾着“政

① 杨晓帆、虞金星整理:《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纪要》,载《文艺争鸣》,2010 年第 1 期。

② [美]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 页。

③ [德] 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第 270 页。

④ [美] 詹姆逊:《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王逢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16 页。

治安全性”的职能。尽管“重返 80 年代”强调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一种政治，并主张在思考文学的政治性的同时进一步思考政治的文学性^①，这一逾越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所实现的“联合”，也许得到的结果如“重返 80 年代”本身所质疑的启蒙现代性的文学史思维一样，最终仍旧陷入与启蒙文学雷同的困局，即文学不文学，政治不政治，既绕开了政治的危险，又回避了文学本质，只留下满腹的“无法消化的知识石块”（尼采）。同时，从福柯的权力想象那里催生的一切形式的对 1980 年代各种权力的揭示，既然不是危险的，便是软弱无力、可有可无的，在知识累积的疲倦姿态下沦为权力的或隐或显的同谋共谰者。

“重返 80 年代”固然无法回避历史和知识的路径，但正如尼采所警告的：“我们需要历史学，但我们需要它，却不同于知识的花园里那爱挑剔的闲逛人之需要它，……我们是为了生活和行动、不是为了舒适地离开生活和行动、或者根本不是为了美化自私的生活与怯懦和糟糕的行动而需要它。”^②无法否认，自新时期以来，从“重写文学史”到“重返 80 年代”都在重复着同样一种错误，即尼采所反复申斥的“我们的历史感培育的错误”、“一种折磨人的历史学热病”，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布鲁姆所定义的由“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组成的文学研究的“憎恨学派”^③。我们需要“重返 80 年代”，但我们需要的“重返”是回到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所引发的痛楚那里，而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知识的花园和历史的旋涡。把 1980 年代变成新的“文献”是一种回避公共价值和现实承担的政治怯懦，而本文之所以把重返 1980 年代的语境仍旧设置

① 李杨：《重返 80 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80 年代文学”研究与人大研究生对话》，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 年第 1 期。

② [德] 尼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收入《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33—134 页。

③ [美]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 年，第 412 页。

为“启蒙”，并不是沿袭旧有的文学史叙事中的新启蒙话语，所谓的回到起点也不是回到新启蒙时代的起点，而是回到启蒙话语的公共性和理性的起点。正如当下公共性中那些触目的现实所昭示的那样，回避启蒙的本质是对日益严峻的现实病痛的逃避，也是对文学遭遇的永恒困境的逃避；不从本质上认识 1980 年代启蒙的得失，就根本没有办法真正面对文学所遭遇的现实问题，而只能在历史的帷幕下不停地追加“历史化”冲动。

回到起点

1980 年代开启于一段沉重的历史剧痛的结束，当 1970 年代末的政治巨变瓦解了一个极端化的政治实验的噩梦之后，认定为导致了极左思潮肆虐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被草草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一个注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和价值重建的重大的转折时期适时地但略带仓促地出现了。正如 1979 年邓小平所说的：“目前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我们党已经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渡过了‘四人帮’给我们设下的重重难关，把一个混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有秩序的、进步很快的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前景激动着、鼓舞着、引导着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广大干部、群众都在争着为这个光明的前途贡献力量。”^①人们沉浸在“转折”的巨大变化的晕眩感中，无暇也没有能力对历史事件的根源进行有效的探究和清理，从政党、国家到人民都急于摆脱过去^②，强烈的改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83 页。

② 正如薇拉·施瓦支所讲的：“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里，当前的‘逻辑’几乎压倒了过去‘逻辑’。当最重要的是未来的‘希望’和‘前进的道路’时，历史成了激发乐观主义精神的工具，而不是解释过去。”参见《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318 页。从 1970 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对“过去”

变现状的自信和热情使得他们对投身于一个被命名为“新时期”^①的大时代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呼应后者的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紧随而至的则是“新启蒙运动”^②或“新启蒙主义”时代的到来,民主、科学、理性、主体、人道等启蒙观念成为主导1980年代精神生活的最强音,沉睡多年的“五四”启蒙精神得到了赓续,重新焕发了生机,迅速改变了时代人的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知识分子和民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到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公共空间中,并且都发挥着

进行了符合限度的批判和反思,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对历史空间的缩减和压抑,这种对“过去”的解释没能形成系统,也没能触及历史的本质。

- ① “我们党所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反映了历史的要求与人民的愿望。”参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在此之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已经提到了“新的发展时期”的概念。
- ② “新启蒙”是一个纠缠着多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内容的复杂概念,1936年底,关于还原“五四”启蒙精神、启蒙与救亡的关系等问题,由艾思奇、陈伯达、张申府、胡绳等发起过“新启蒙运动”,进入21世纪一部分学人也倡导过“新启蒙主义”,发表了一系列引发争论的文章,并在网络上建立“新启蒙论坛”,编辑出版过“新启蒙文丛”。本文主要指的是以1988年10月《新启蒙》杂志创刊为标志的、主导着1980年代中后期的启蒙思潮的“新启蒙运动”。《新启蒙》以王元化等人为核心,先后出版发行了四册,分别为《时代与选择》(1988年10月)、《危机与改革》(1988年12月)、《论异化概念》(1989年2月)、《庐山会议教训》(1989年4月),均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89年4月停刊。王元化本人在阐释《新启蒙》创刊宗旨的时候说:“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为‘新启蒙’,无非是说现在的思想启蒙不仅是继承五四的启蒙运动,而且加以深化了。”(《文汇报》1989年4月16日)但本文还是较为认同一些学者对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在时间和启蒙内容上作出的区分(参见许纪霖、罗岗等编著:《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3—6页)。